

館長寄語

「絲貴如金：中亞與中國紡織品」是首個關於8世紀至15世紀早期中亞與中國生產的高級絲綢和刺繡的特展。這些紡織品密切反映了王朝興衰和帝國擴張與瓦解之時，中亞和中國之間權力平衡的諸般變化。從我們身處20世紀末的視角來看，很難完全理解高級絲綢和刺繡曾具備的非凡重要性。除了用於服裝和室內陳設，這些織物甚至定義了皇家、宮廷和神職人員的等級。它們曾作為皇室的贈物，也常見於外交使節入貢和受贈的禮單。作為令人艷羨的商品，精心織造和帶有精美刺繡的絲綢被運到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和意大利的威尼斯這些遠在千里之外的港口。此外，租稅也常以織金絲綢的形式上繳。絲綢的設計不僅融入了當時的裝飾紋樣和主題，且由於其傳播甚遠，在裝飾圖案和風格上，絲綢在不同地域間的交流發揮了特別積極的作用。

「絲貴如金」特展匯集了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Cleveland Museum of Art)和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關於中亞和中國的織物藏品。這是西方在絲綢方面最重要的兩組收藏。藏品年代可追溯到唐代晚期至明初數十年，而且包括一些在中國未被保存下來的絲綢和刺繡類型。這些藏品反映了這兩家博物館數十年來不懈努力收集早期亞洲重要紡織品的成果，尤其在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當時出現了大量此類紡織文物，其中許多文物填補了中亞和中國早期紡織刺繡史的空白，使我們在這方面的認知在短短十年

間得到極大提升。1992年，兩家博物館決定舉辦一場聯合展覽，目的是引起學術界和公眾對這些紡織品的更多關注，並探討這些最新發現對亞洲紡織史的影響。

中亞和中國生產的高級織物的歷史遺存尚未被充分發現和出版。高級織物在歷史上和藝術史上都很重要，但卻一直被西方藝術史學者所忽視。中國在過去的25年內取得了許多關於織物的重要發現，特別是10至14世紀織物，儘管其中許多尚待初步調查、攝影和分析。我們需要對這些材料進行全面研究。

本書是邁向這一目標的重要嘗試。它匯集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布魯克·拉塞爾·阿斯特(Brooke Russell Astor)亞洲藝術資深策展人屈志仁(James C. Y. Watt)在中國藝術方面的學術知識，以及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紡織品策展人華安娜(Anne E. Wardwell)對早期織物的廣泛知識。此外，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的中國和中亞史教授羅茂銳(Morris Rossabi)博士為本書撰寫了〈前言：中國與中亞地區的絲綢貿易〉，為這一複雜時期提供了歷史背景。本書不僅是這次展覽的圖錄，而且還是一部學術著作，對中亞和中國的緯絲演變、金代和蒙元時期的妝花織物、蒙古帝國的奢華絲綢等課題做了獨到的研究。

在紐約，這場展覽得到了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的部分贊助，以及威廉·倫道夫·赫斯特基金會(William Randolph Hearst Foundation)的支持。在克利夫蘭的展覽由凱爾文和埃莉諾·史密斯

基金會 (Kelvin and Eleanor Smith Foundation) 贊助，以紀念該博物館首位紡織品策展人格特魯德·昂德希爾 (Gertrude Underhill) 女士，展覽也得到國家人文學科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的一大筆資助。我們也感謝安德魯·梅隆基金會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對本書的慷慨支持。

羅伯特·P·伯格曼 (Robert P. Bergman)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

菲利普·德·蒙特貝羅 (Philippe de Montebello)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致謝

本次特展和圖錄是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多年合作的成果。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長菲利普·德·蒙特貝羅(Philippe de Montebello)和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前館長埃文·特納(Evan Turner)同意並鼓勵了有關這次展覽的最初提議。在黛安·德·格拉齊亞(Diane De Grazia)的幫助和羅伯特·P·伯格曼(Robert P. Bergman)的主理下，這一項目在克利夫蘭得到長期支持。

多年研究期間，我們得到了其他博物館同事的慷慨幫助與合作，包括：柏林印度藝術館的瑪麗安·雅迪茲(Marianne Yaldiz)；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的維利博爾德·維特(Wilibald Veit)；柏林裝飾藝術博物館的沃特羅·伯納一拉斯欽斯基(Waltraud Berner-Laschinski)；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的維里提·威爾遜(Verity Wilson)；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的漢斯·克里斯托夫·阿克曼(Hans Christoph Ackermann)、梅赫提爾德·弗洛里-萊姆伯格(Mechthild Flury-Lemberg)、雷古拉·紹爾塔(Regula Schorta)和卡雷爾·奧塔夫斯基(Karel Otavsky)；斯德哥爾摩瑞典歷史博物館的馬格瑞塔·諾克特(Margareta Nockert)；聖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葉夫根尼·盧波-列斯尼琴科(Evgeny LuboLesnitchenko)；紐瓦克博物館的瓦拉·雷諾茲(Valrae Reynolds)；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白瑞霞(Patricia Berger)；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的基思·威爾遜(Keith Wilson)；芝加哥藝術學院的斯蒂芬·利特爾(Stephen Little)，以及東京文化學園服飾博物館的道明三保子(Mihoko Domyo)。此外，我們還要感謝大英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允許我們研究斯坦因藏品，並提供了照片。

1996年，我們曾在中國有一次深入的研究之旅，當時到訪的所有機構都給予了我們充分的禮遇與合作。我們尤其要感謝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楊新和陳娟娟；遼寧省博物館的楊仁愷、徐秉坤和王綿厚；黑龍江省博物館的楊志軍和孫長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的武敏和伊斯拉菲爾·玉素甫；新疆考古研究所的王炳華；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的黃雪寅；內蒙古考古研究所的劉來學和齊曉光，還有中國絲綢博物館的趙豐。與眾多中國學者的討論和交流使我們受益匪淺，特別是北京的陳娟娟和黃能馥；瀋陽的徐秉坤；烏魯木齊的武敏和王炳華；杭州的趙豐，還有上海的高漢玉和屠恆賢。

我們也要向慷慨允許我們研究私人藏品或提供照片的收藏家致謝，包括：克里希納·里布(Krishna Riboud)、賀祈思(Chris Hall)、托馬斯與馬戈·普利茲克(Thomas and Margo Pritzker)、傑奎琳·西姆考克斯(Jacqueline Simcox)、弗里德里希·斯普勒(Friedrich Spuhler)、里絲貝特·福爾摩斯(Lisbet Holmes)、艾倫·肯尼迪(Alan Kennedy)、斯蒂芬·麥吉尼斯(Stephen McGuinness)、阿瑟·利柏(Arthur Leeper)、法比奧與安娜瑪麗亞·羅西(Fabio and Anna Maria Rossi)、大衛·沙爾蒙(David Salmon)、邁克爾·弗朗西斯(Michael Frances)、弗朗西絲卡·加洛韋(Francesca Galloway)、戴安·霍爾(Diane Hall)。

許多學者也為這個項目提供了寶貴的資源。我們尤其要感謝米爾頓·桑代(Milton Sondag)慷慨地花了很多時間來解決許多組織結構的細節，並在整個技術分析和圖錄的紡織詞彙表的編寫過程中寬宏地提供幫助；感謝丹尼爾·德·容格(Daniel De Jonghe)對加捻與未加捻經線的

仔細觀察；感謝艾倫·肯尼迪 (Alan Kennedy) 分享了關於日本早期紡織品收藏的資訊；感謝弗朗西斯·普里查德 (Frances Pritchard) 提供有關埋藏對纖維影響的資料。我們非常感謝托馬斯·愛爾森 (Thomas Allsen) 提供了他即將出版的著作《蒙古帝國的商品與交流：伊斯蘭紡織品文化史》的初稿 (譯註： *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亞當·凱斯勒 (Adam Kessler) 提供了一份重要但難以獲取的內蒙古考古報告。我們通過伍卡·魯薩基斯 (Vuka Roussakis) 和其他工作人員的介紹和幫助，使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得以允許我們對該館「超越長城的帝國：成吉思汗的遺產」特展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The Heritage of Genghis Khan*) 的紡織展品做技術分析。我們非常感謝希瑟·斯托達德 (Heather Stoddard) 提供了在拉薩所調查的緯織唐卡的背面資訊；阿米娜·馬拉戈 (Amina Malago) 慷慨地告知了我們她對於緯絲的見解；唐·孔恩 (Don Cohn) 提供了對於我們赴華研究考察之旅有幫助的資訊。同時，特里·米爾豪普 (Terry Milhaupt) 在日本提供了與我們研究相關的日本紡織品出版物的複印件；傑羅·格蘭格-泰勒 (Hero Granger-Taylor) 提供了一張圖像以及與關於一件米蘭聖安波羅修聖殿紡織品的重要技術資訊；羅伯特·林羅特 (Robert Linrothe) 與我們親切地探討了有關西夏的材料。我們也非常感謝保羅·涅圖普斯基 (Paul Nietupski) 對西藏佛教儀軌和語境的熱心解釋和幫助，以及格納迪·列奧諾夫 (Gennady Leonov) 對有關蒙古帝后的大型曼荼羅 (圖錄 25) 提供了圖像學解釋。

我們要感謝以下譯者：希拉·布萊爾 (Sheila Blair) 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題記以及術語方面提供了寶貴幫助；休·理查森 (Hugh Richardson) 和希瑟·斯托達德 (Heather Stoddard) 翻譯了藏文；宋后楣 (Hou-mei Sung) 和鮑海倫 (Helen

Pao) 翻譯了大量中國考古報告和文獻；稻垣美紀 (Miki Inagaki) 和佐森紗由理 (Sayuri Sakarmori) 翻譯了日語文獻；Yunah Sung 提供了漢語和日語翻譯；瑪麗·羅沙比 (Mary Rossabi)、尤金妮婭·文伯格 (Eugenia Vainberg) 和迪米特里·維森斯基 (Dimitry Vessensky) 翻譯了俄文資料，魯思·鄧奈爾 (Ruth Dunnell) 對西夏文本作了翻譯和論述。

兩家博物館的許多工作人員都參與了這個項目。我們首先要感謝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艾倫·萊溫 (Ellen Levine) 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喬伊斯·丹尼 (Joyce Denney)，感謝她們對項目無數細節不可或缺的幫助和始終不渝的關注。此外，艾倫·萊溫還繪製和復原了紡織品圖案並協助編寫術語詞彙表；喬伊斯·丹尼與製圖師威廉敏娜·雷因加-阿莫海因 (Wilhelmina Reyinga-Amrhein) 一起繪製了地圖；阿尼塔·蕭 (Anita Siu) 和劉晞儀 (Shi-ye Fiedler) 一起編寫了原書的漢語和日語詞彙表；尼娜·斯威特 (Nina Sweet) 則負責錄入屈志仁的手稿。

如我們所預期，為了準備公開展覽，必須對這些藏品先期進行大量保護工作。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凱倫·克林比爾 (Karen Klingbiel)、赫爾曼·阿爾特曼 (Hermine Altmann)、卡特琳·科爾本 (Katrin Colburn)、貝蒂娜·貝森科特 (Bettina Beisenkotter)、貝蒂娜·尼卡普 (Bettina Niekamp) 和安吉麗卡·斯利卡 (Angelika Sliwka) 都在布魯斯·克里斯曼 (Bruce Christman) 的指導下工作，並提供科學分析。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保護和分析工作以及顯微照片均在梶谷宣子 (Kajitani Nobuko) 的指導下完成，其主要得力助手為佐藤みどり (Midori Sato)。此外，我們要感謝瑞士的凱瑟琳·科切爾-列普雷希特 (Kathrin Kocher-Lieprecht) 和伊娜·凡·沃斯基-涅德曼 (Ina von Woyski-Niedermann) 對一件袈裟 (圖錄 64) 的協助保護。

兩家博物館的圖書館工作人員給我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支持。發現和獲得已出版的文獻十分

不易，為了在無數圖書館之間借書並協助匯編書目，他們不辭辛勞。為此我們要特別感謝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安·阿比德(Ann Abid)、路易斯·阿德利安(Louis Adrean)、喬治娜·托特(Georgina Toth)和克里斯汀·埃德蒙森(Christine Edmonson)，以及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傑克·雅各布(Jack Jacoby)和比利·關(Billy Kwan)。

感謝凱特·塞勒斯(Kate Sellers)和她的工作人員為克利夫蘭的展覽有效地籌集了資金支持。克利夫蘭的展覽由凱蒂·索倫德(Katie Solender)協調，傑弗里·巴克斯特(Jeffrey Baxter)設計和監修。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琳達·西爾林(Linda Sylling)負責監督這個項目，展覽由丹尼斯·科伊斯(Dennis Kois)和傑弗里·L·戴利(Jeffrey L. Daly)設計，由芭芭拉·維斯(Barbara Weiss)負責繪圖。霍華德·阿格里斯蒂(Howard Agriesti)在格雷·金申堡(Gary Kirchenbauer)的協助下對克利夫蘭的紡織品拍攝了文物照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紡織品則由李藹昌在安娜·瑪麗亞·凱倫(Anna-Marie Kellen)的協助下拍

照。此圖錄的彩色圖版是他們富於技巧和感受力的明證。

關於克利夫蘭展覽的公共項目，我們要感謝馬喬里·威廉姆斯(Marjorie Williams)和喬埃倫·德奧里奧(Joellen DeOreo)。特別感謝紡織藝術聯盟(Textile Art Alliance)在展覽中捐贈了若干藏品，並與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公眾項目和教育部合作發起和推進了紡織藝術展。肯特·萊德克(Kent Lydecker)在伊麗莎白·哈默(Elizabeth Hammer)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教育部其他成員的協助下，於紐約組織了各類公眾活動和教育項目。

衷心感激我們耐心和辛勞的編輯艾米麗·沃爾特(Emily Walter)，以及布魯斯·坎貝爾(Bruce Campbell)設計的精美裝幀，並對格溫·羅金斯基(Gwen Roginsky)監督出版這一圖錄表示感謝。我們也感謝約翰·P·歐尼爾(John P. O'Neill)對本書出版的重視。

最後，我們要感謝勞倫斯·錢寧(Laurence Channing)為此次特展提出命名建議。

屈志仁 (James C. Y. Watt)
華安娜 (Anne E. Wardwell)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譯者序

1996年9月2日至3日，我受外文出版社邀請，到北京參加「《中國絲綢藝術》編寫座談會」。這是一個中美合作的大項目，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座談會由外文出版社領導李振國先生和項目負責人廖彥老師主持，王莊穆、黃能馥、陳娟娟等幾位相關的著名學者都到了。除了項目的外方負責人James Peck，與會的還有兩位海外學者——一位是與我通信多時的俄羅斯的陸柏先生，另一位是我從未謀面的屈志仁先生。

這是我第一次見屈先生。他的全名是屈志仁 (James C. Y. Watt)，有不少人會把他的名字音譯成詹姆斯·瓦特。實際上，他生於香港，是「嶺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的後人。早年在牛津大學學習物理，後來回到香港大學跟隨饒宗頤先生學習，1971年至1981年間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創始館長。1981至1985年間在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 (MFA) 擔任亞洲部主任。後於1985年來到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先任中國古器物及工藝品高級顧問，1988年成為亞洲藝術部高級主任 (Brooke Russell Astor Senior Curator)，2000年開始擔任亞洲藝術部主席。與當時大多數西方博物館的東方部相比，屈先生領導下的大都會亞洲藝術部關注考古實物、雜項的研究，多於傳統的中國藝術如書畫、青銅和瓷器。同時，他也更多關注亞洲甚至是歐亞大陸間的文化交流研究。

見到了屈先生，才知道還有一位克利夫蘭博物館 (CMA) 的研究館員華安娜女士 (Anne Wardwell) 同來，他們除了要商量《中國絲綢藝術》的事宜，還要籌備一個關於中亞和中國絲綢

的展覽「絲貴如金：中亞與中國紡織品」，為此要走訪中國各地的博物館。

「絲貴如金」是第一個以絲綢為主題切入的絲綢之路展覽。我於1997至1998年之際得屈志仁先生之邀赴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作客座研究，其主攻方向就是遼金元時期的中國北方絲織品。其間恰逢「絲貴如金」在紐約開幕，我在屈先生的指導下反復研究了其中大部分展品。展後又赴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向華安娜女士請教。後來，我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研究的主要成果《遼代絲綢》(Liao Textile and Costumes, 2004) 經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林業強館長建議由沐文堂出版，屈志仁先生也為此撰寫了序言：「儘管和中國主流文明已經有了近千年的密切接觸，契丹人一直到他們建立其帝國依然保持着一些游牧傳統，始終認為精美的絲綢和黃金是最貴重的品物。因而，契丹內對中國織工的要求是極為苛刻的——早期的蒙古帝國也一樣」。

確實，蒙元時期的中國藝術史非常複雜，往往不為西方藝術史家所知。特別是黨項、遼和金，基本局限在中國北方。還有西藏與蒙古統治者的關係，與元文宗和明宗與曼茶羅緯絲的關係，都很有意思；春水秋山的習俗，宋元青綠山水緯絲的影響等等，都很值得探究。這方面的研究涉及的研究領域廣，極缺通才。這次展覽合作的團隊是美國博物館中對中國紡織品研究力量最強的MET和CMA，兩者有強大的紡織品部和亞洲部，具悠久的研究歷史。CMA紡織品策展人華安娜對早期紡織品有很好的學術背景和廣泛認知，而MET的屈志仁在中國藝術方面學養深厚，在中世紀和雜項類藝術品方面的研究獨

樹一幟。由權威的博物館、權威的研究員、中世紀的紡織品專家、經驗豐富的研究檢測人員及修復師通力協作，才達成展覽最終呈現的效果。這樣的合作成果，在絲綢藝術史上無疑將留下重要一筆。

「絲貴如金」展覽的資料新鮮，其中的藏品大部分都是MET和CMA的新近收藏，正是基於這樣的新材料，得到了許多較新的觀點，且具有權威性。此書的價值起碼有如下幾點：

其一、唐代絲綢和遼代絲綢的研究中，最為重要的是斜紋緯錦。關於遼式緯錦，以前的文獻中介紹相對較少。這是第一次在國際上進行較為明確的鑒定和權威解釋。

其二、本展覽呈現了蒙元時期的最全面研究，如緯絲。其中有一組新面世的緯絲，這組緯絲色彩很新，很明顯具有雲肩裝飾，可以定為是元代的風格。當中展出的緯絲曼荼羅，是緯絲史上絕無僅有的珍品。

其三、第一次披露新出的一批「金段子」也十分重要，其主題一方面帶有十分明顯的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色彩，在遼史和金史等史籍中有所記載，另一方面則是中國較為傳統的龍鳳等紋樣。這類織物一直是遼金元的基本特色，正反映了蒙元時期加金織物的東方情調。

其四、納石失是蒙元時期最有特色的織金錦，採用的都是特結錦的結構。無數人寫過相關的文章，但卻沒有人把納石失和普通的織金錦分得很清楚。此書詳細考證了納石失名稱的來歷，特別是展示了一批新的有着西亞和中亞風格的納石失織物。

其五、刺繡是此書的第五個重點，這裏的刺繡貫穿了唐遼金元明五個時代，從最初唐代花樹對鳥紋刺繡，到遼宋時期的對翟鳥紋繡，和元代極為華麗也帶有着中亞風格的四方獸花鳥紋繡，一直到早明的刺繡袈裟和大黑天唐卡；但其中最具學術價值的是用了較大篇幅介紹了新登場的一組環編繡，這也是當時國際學術界的一個熱點。

基本說清了環編繡自蒙元時期開始出現起，到明代達到高峰的一個史實。

「絲貴如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它之後，有了1999年年末瑞士阿貝格基金會(Abegg Stiftung)舉辦的中世紀絲綢展覽和學術討論會；以及2013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交織全球」(Interwoven Globe)展覽。2015年，我在中國絲綢博物館也策劃了「絲路之綢：起源、傳播與交流」展覽，用絲綢來講絲綢之路的故事，以小切口來敘述大時代和大世界，並由此開啓了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絲綢之路主題系列特展，一直延續至今。

正是基於此展此書的重要性，以及對我學術生涯的重大啓迪，我一直念念不忘想把此書介紹給國內的學生和讀者。2016年中國絲綢博物館完成了改擴建工程，我也有了不少學生，我開始每年在中國絲綢博物館組織一次讀書班。當時的想法是每年讀一本英文專著，讓我的博士生先通讀，然後在讀書班上進行交流，再作報告。我們還在讀書班上找出相關的藏品進行觀摩。之後，我們把這些報告開放給博物館的觀眾，與他們進行分享。讀書班結束後，我們組織大家籌備進行正式的翻譯。在研讀和翻譯內容的選擇和分配上，我們考慮到各自的研究領域和興趣。2019年我們選擇精讀的圖書就是*When Silk Was Gold*，由徐錚負責協調館內的日程安排。

此後我們繼續完善讀書班前後完成的譯稿，爭取出版此書的中文版。參與此項工作的人員很多，我翻譯了〈前言〉、王樂翻譯早期交流，徐蕾和王業宏翻譯緯絲，茅惠偉和鄺楊華翻譯妝花織物，蔡欣翻譯織金錦，徐錚翻譯刺繡。同時，由苗薈萃和金鑾梅整理參考文獻。治學過程中，我們早已認識到在對古代絲綢技術細節的描述上，中英文存在各自的表述特點。在讀書班期間和隨後的翻譯工作中，重點和難點在於統一術語的同時，尊重中文對於古代絲綢技術和紋樣的固有表達，遵循並完善近幾十年以來國內研

究者建立的古代紡織相關的術語體系。為了使全書文字風格與技術體系盡量達到一致，譯者們一遍又一遍地通讀和校對譯稿，爭取各章節之間能夠前後對應，付出了很多心血。在翻譯過程中，大家更體會到原書的作者們行文暢達、表述準確、文獻精當的寫作特點，在翻譯過程中完成了一次難得的對經典學術範式的學習。原文有時難免有些筆誤和需要更新的地方，在譯文中，我們以「譯註」的形式簡要說明。

沒有多方的支持和通力協作，這樣一部專業性極強、也頗具可讀性的重要學術著作，根本無法完成翻譯並出版。我首先真誠感謝屈先生和

華女士，以及MET和CMA的團隊，再是感謝譯者們的認真付出，然後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專業支持和北山堂的慷慨資助。

屈志仁先生樹立在絲綢之路上的旗幟並不止一面，除了《絲貴如金》，還有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AD*（《走向盛唐》）和 *The World of Khubilai Khan*（《忽必烈的世界》），我將它們稱之為屈先生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關於絲綢之路展覽和著作的「三部曲」。我期待《絲貴如金》正式出版後，後面兩部著作的中文版可以陸續問世。

趙豐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